

中法建交:突如其来的“外交核爆”



周恩来会见埃德加·富尔

1964年1月27日,中国《人民日报》和法国《世界报》同时在头版刊登中法两国建交消息,轰动国际社会,被称作“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当时担任我国外交部西欧司法国科负责人的张锡昌参与了相关谈判,他撰文回忆了当时鲜为人知的故事。

神秘来客住进钓鱼台

1963年10月22日,北京来了一位神秘客人。他不是政府成员,也没有正式的外交头衔,却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此人乃是受戴高乐委派来华商谈中法建交问题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周恩来和陈毅同富尔先后在北京、上海进行了六次实质性会谈。

谈判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双方出现重大分歧。富尔虽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一再强调,希望中方不要强加给戴高乐使他“不愉快或者丢脸的条件”;希望中方不要坚持让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凡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双方谈判

一度陷入僵局。

周恩来口授三点默契

最后两轮会谈在上海举行。考虑到中法建交有利于打破美国和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包围,也有利于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世界事务,而且对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中方拟定了“直接建交”新方案。即:不要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内部默契这种匠心独运的方式处理法台关系问题,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义务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

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小住,他先后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毅等面商后,在“直接建交”方案上批示:“照此办。”

我随同富尔去上海途中,一路上富尔情绪低落。抵上海不多时,我被周恩来召到他办公之处。总理口授了三点默契的内容,由我笔录,随后译成法文,交给富尔。

看完译文,富尔愁容顿消,认为这个方案合情合理,可以接受。周恩来和富尔着重就三点默契的措辞反复推敲、斟酌,最后达成一致。主要内容是: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法台断交后,法国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11月2日,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

双方按默契行事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此前,中方组成以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为代办的建馆先遣班子,我忝为成员之一。法方也任命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克洛德·沙耶为代办,整装待发。

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国民党驻巴黎“大使馆”赖着不走。1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代表团时,明确表示:法台关系不解决,“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当时周恩来在国外访问,邓小平接见宋代办和我时,指示代办早日赴法,首要任务是进行“驱蒋”斗争。法方也要求中国代办先去巴黎,以利于挤走台湾的“外交代表”。于是,先遣人员定在大年初二(2月14日)离

链接

中法曾创造多个第一

1973年,乔治·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国家元首,也是西欧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中法公报》表达了两国政府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望。

随后的许多年里,中法两国一起创造了多个“第一”。其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莫过于中法核能的合作。

据一位核能专家回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察团到苏联、美国、欧洲等地核电站参观时,其他国家均不让中国科学家进入核心部位,只有法国全面开放让我们参观”。因此,1978年

京赴法。先遣组将视“驱蒋”斗争的进展情况,作好留与撤的两手准备。

戴高乐信守协议,按三点默契行事。2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驻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尽管美国要蒋介石不主动同法国断交,但是,迫于形势,台湾当局不得不于同一天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并撤销其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机构”。法国也宣布相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驱蒋”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它为实施中法建交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中法两国代办2月23日同时到达对方首都。宋代办一行抵达巴黎受到盛大欢迎,单是前来摄影、报道的记者就有数百名之多。即此一端,足见中法建交的轰动效应。张锡昌

中方决定向法方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

从那时起,中法核能合作就推动着中国核电产业由弱到强,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产业体系,成功走出一条从引进技术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包括燃料生产、设备制造、工程建设、技术研发在内的完整核电产业网络。这是中国高端核电技术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除了核电技术,2004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华,中法双方正式签署高铁合作协议,这是中国对外签署的第一个高铁协议。周洁

戴高乐与罗斯福为何互不待见

久、直接的关系。然而,罗斯福热衷于与法国维希投降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对戴高乐则持一种冷淡的甚至敌视的态度。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罗斯福也丝毫没有与戴高乐打交道的意思,特别是当英美盟军在1942年11月初成功在北非法属殖民地登陆时,作为自由法国抵抗运动负责人的戴高乐事先根本不知情,因为罗斯福要求对戴高乐保密。

与戴高乐受到的冷遇相比,美国人更倾向于和维希政权内部的高级官员打交道,罗斯福选择了吉罗上将来扛起法国抵抗运动的大旗,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并强迫戴高乐听从吉罗的指挥。可吉罗偏偏是一个扶不上墙的阿斗,最终还是戴高乐在抵抗运动内部占了上风。

罗斯福不得不承认戴高乐作为法国抵抗运动

一把手的领导地位,但对戴高乐依旧充满厌恶。1944年7月初,罗斯福邀戴高乐访问华盛顿。为了欢迎戴高乐的到来,罗斯福为其鸣响17声礼炮,这通常是欢迎外国军事领导人的礼节,而作为国家领导人按理说应该鸣炮21响,显然罗斯福没有把戴高乐看成法国的领导人。这之后,罗斯福打压戴高乐的行为一直没有停止,直到1945年4月,罗斯福因脑溢血去世,两位政治家的关系在不和中终结了。刘占青

“三八六旅” 让日军闻风丧胆

抗战中,日军曾有一个口号:“专打三八六旅”。这是为什么?

“西安事变”后不久,八路军129师386旅就来到抗日前线。他们在山西省平定县七亘村同一地点两次设伏,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共歼灭日军400余人,缴骡马近400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创造了“重叠的待伏”这种奇妙的战法。

几个月后,386旅用“引蛇出洞计”在神头岭设伏,两个小时枪战加肉搏,毙伤鬼子1500人,缴获长短枪500多支。随后,又在响堂铺设伏,一个“口袋阵”套住500多名鬼子,毙伤其400多人,缴获汽车180辆。此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邀请国民党高级将领现场观战,国民党将领为之叹服。这三战打疼了日军,也使得八路军声望大增。

1939年2月,386旅在冀鲁豫大平原的威县香城固再次隐蔽集结,派出小股部队连续袭击城镇要地,吸引鬼子出动。2月10日,日军四十联队一个加强中队的坦克和汽车陆续进入386旅的伏击圈,一营立即开火,击毁了头一辆汽车,击毙了日军的翻译官,击伤了中队长安田。安田知道上当了,立即命令后撤。然而,为时已晚,香城固的“口袋阵”越扎越紧。经过8小时激烈战斗,日军一个中队的兵力全部被歼灭。香城固一仗,给日军再次造成沉重打击,振奋了根据地人民的斗志,对巩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386旅自然成了日军的眼中钉。

2月11日,鬼子调来了70辆汽车、2000多人的部队,派出5架飞机配合,出动坦克,拖着重炮,装甲车上贴着“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沿途搜寻386旅机关和部队。

这时,386旅已转移至邱县。日军车队又追向邱县。386旅又转移至馆陶以北的尖冢附近,日军追到尖冢时,386旅已渡过卫河,转移到了冠县。鬼子尾随追击了整整7天,还是没有追上。

陈赓率领386旅徒步与鬼子的汽车赛跑,每次都机动地在宿营的当晚又转移了地方。鬼子始终没有追到386旅,最后只得恼恨而归。

有人计算过,在抗日战争中,386旅转战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先后战斗850余次,毙伤俘日伪顽军2.5万余人,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我军力量。博文